热点透析

跪着的德国比站着的日本高大得多

□张仕荣

今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东京发表演说时指出：德国战后正是因为认真直面过去，才获得邻国的宽容和国际社会的接纳。对此，日本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鼓噪德国没有资格教训日本。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表示，日本应该借鉴德国正视历史的态度，寻求与邻国和解。他指出，日本和德国一样对邻国造成了伤害，侵略历史的本质是一样的。因此，日本政府所谓“不能单纯对日德进行比较”的表态并不成立。

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德国无疑是日本的榜样。第一，彻底清算战争罪行是德、日回归人类道义高地，改善国家形象，锻造国家软实力的必经之路；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看，甩掉历史包袱才能获得正常的国家身份，在全球事务及区域一体化方面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二战中被纳粹无辜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此举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勃兰特一跪使德国真正站起来了，许多历史评论家认为，“跪着的德国远比站着的日本显得高大”。

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远离战争，珍爱和平”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强势话语，这集中反映了全球社会对于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反思与深刻检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的人约为7000万，中国约占1800万人。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南京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清洗，纳粹德国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因此，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对于战争的记忆与痛恨仍然深入骨髓，“远离战争、珍爱和平”正是人们对战争反思后的深切渴望。

如今，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对德外交中基本没有反复要求德国认清历史问题，这与德国自身的战争忏悔行动与国民历史理念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德国能认真地直面过去那段历史，才能达成“宿敌”间的和解，并使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参与并引领欧洲的发展。

从某种角度来看，日本至今对战争的清算不彻底与美国冷战全球布局有关。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决定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付共产主义扩张。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美国当局对战后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尤其是对日本人的封建意识和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肃清，这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右翼分子抬头埋下了伏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释放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甲级战犯嫌犯，免除起诉石原莞尔、井上日召等右翼战犯，其中岸信介于1957年任日本首相，导致日本政坛迅速右倾化，掀起反共、反华高潮。

当然，外来力量改造不力只是一个因素，日本政府和国民的自我反思不够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冷战结束至今，日本国内并非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199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他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的悲惨告诉年青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然而，“村山谈话”没能被继承下来。许多亚洲国家如今都在担心日本可能再走“军国主义”道路，因为安倍政府和日本右翼政客对待历史和靖国神社的态度，令亚洲国家和人民大失所望。2013年，安倍对美国《外交》杂志表示，靖国神社类似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故前往参拜也无妨。安倍强调，靖国神社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供奉的都是为国效命阵亡将士的灵魂。必须指出，安倍是在混淆概念。靖国神社与阿灵顿公墓的性质根本不同。靖国神社不是墓地而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宣扬“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被列入“灵玺簿”，作为“英灵”合祀于此。1978年14名二战甲级战犯亡灵也被供奉其中。这是对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战后，靖国神社虽然改为所谓民间宗教设施，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使其重新恢复战前的国有地位，而且前往参拜的日本政客经常为侵略历史翻案，由此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同样的歪曲也出现在慰安妇问题上。2013年5月13日，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桥下彻宣称：“慰安妇制度在当时维持军队纪律方面是有必要存在的。”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烈谴责说：“桥下市长的言论肆无忌惮且令人愤怒。美国已经声明，日本当时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的行径令人发指，明显属于极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日本政治人物发表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事关受害者人格尊严的重大人权问题。如何对待过去将决定日本如何走向未来，日本究竟作何选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将拭目以待。

由于不同的历史清算态度和立场，德国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德国主动与欧洲和解并推动欧洲一体化，德国与法国共同成为欧盟经济的发动机并引领欧盟对外事务。在当前欧债危机仍未根本解决的背景下，德国被各界认为是“欧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德国在欧盟和西方社会的领军作用逐步增强，许多欧洲国家认同德国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由于德国经济实力最强，关键在于德国成功地在世人面前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相当长时期，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一心发展经济，远离国际政治问题。然而与德国不同的是，冷战刚结束，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普通国家”的目标，增加军事力量、试图修改其和平宪法，希望作为美国的盟国重新使用武力卷入战争行动，试图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等等。但是，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退和地区安全上的不透明，尽管其多年来在外交领域拼尽全力，但政治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中国一直本着冷静和耐心的态度处理中日问题。2014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两国2000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历史观、战争观是人类基本价值观之一。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有利于日本早日卸下历史包袱。前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先生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评述：同样是战败国，德国坚持自主意识，战后由于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而强化了自己的影响。而日本既丧失了进行战争清算的魄力，也丧失了进行战争清算的自主意识。以什么“一亿人的总忏悔”的方式草草了事，把问题搪塞过去，却原封不动地被纳入日美军事同盟体制，至今已经在美国管治之下度过了60个岁月。



慈善委员会和英国慈善组织监管的特色制度

□陆奇斌

英国作为世界慈善文化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经过近五个世纪的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国家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不但极大地释放了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而且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这些成就与英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独特的管理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英国慈善委员是管理制度体系中最具有特色的机构，也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

目前，英国设有英格兰及威尔士慈善委员会、苏格兰慈善委员会、北爱尔兰慈善委员会，分别监管各自辖区内的慈善组织。其中，成立于1853年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慈善委员会管辖范围最广、管辖数量最多，在利物浦、伦敦、新港和陶顿设立了四个办公室，共雇用了323人，年度预算支出达3290万英镑。

慈善委员会的诞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以英格兰及威尔士慈善委员会为例，当年时值英国民间慈善蓬勃生长，同时也伴随着必然的乱象，比如假借慈善之名敛取不义之财，慈善资金、物资等资产管理不善。慈善活动纠纷导致的法律诉讼案件一度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相当比例。为了规范和整治慈善领域的混乱局面，英国政府决定加强慈善法制监管和行政管理，为此英国政府在1853年推出《1853慈善信托法》的同时，也由英国议会委派慈善事务专员牵头成立了英国慈善事业治理小组（即慈善委员会），由该机构独立审查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慈善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对英国议会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英国政府公权力在民间慈善事务上的体现，旨在通过法制和机制来规范英国的慈善组织，探索建立英国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

慈善委员会是嵌套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中间构件，也是政府对民间慈善行使监管职责的缓冲层。慈善委员会是一家非内阁部门，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时独立于政府之外。以英格兰及威尔士慈善委员会为例，慈善委员会直接对议会负责，由1名主席和4名委员负责日常管理。每年3000万英镑左右的委员会预算是从公共资金中拨款。出现于19世纪的慈善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被定位为一个准司法机构，既有和政府沟通的管道，也有不受政府影响而独立运作的权利和空间。换句话说，既代表政府行使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又保持慈善机构所需要的中立立场，很好地起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联接和缓冲作用。

英国慈善委员会的核心功能是代表政府行使对民间慈善监管。英国慈善委员会的产生背景，决定了它是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形成的机构，就是要代表英国政府对民间慈善进行监管，因此不同于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之类机构的服务定位。它现有的五大职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定位：一是提供注册服务，负责对那些只以慈善为目的的机构提供注册服务；二是对那些存在问题的慈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三是确保慈善组织运行符合法规要求，例如每年的信息披露；四是确保每个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具有广泛的有效性；五是为慈善组织提供在线服务和指导。这五项基本职能在执行中都体现出相关的监管要求，例如：在注册方面，要求任何慈善组织都必须在慈善委员会记录在册；在财务监督方面，慈善委员会被赋予了对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的权利。按照英国《慈善法》的规定，慈善委员会可依法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和事务介入，甚至在发现存在诸如重大信誉危机、慈善资源严重滥用等情况下，慈善委员会甚至可以采取任命新的机构负责人或慈善信托人来接管问题机构。

英国慈善委员会监管的目的是要以监管促发展。从本质来看，监管只是慈善委员会的工作手段，其终极目的还是要通过监管来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慈善委员会可以看作受托于英国议会，代表政府来行使维护公众利益的职责，监督、引导慈善资源的有效应用，支持和维护民间慈善机构的权益。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固化了这个目的，在《2006年慈善法》中规定，慈善委员会的战略目标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提升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第二，改良公众利益；第三，强化慈善组织的法律意识，确保它们的行为具有必要的合法性；第四，促进民间慈善资源的有效流动；第五，明确慈善组织的问责制度，要求慈善组织对捐助人、受助人、公众等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英国慈善委员会采用协同共治对慈善组织开展全面监管。尽管慈善委员会具有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能，但英国政府也并非完全依赖于慈善委员会，而是由高等法院、皇家检察总长、国内税务署、遗嘱事务署、英国费用评级机构、公司登记署、地方政府等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与慈善委员会共同协作行使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这些机构同样具有对慈善组织的部分监管权，并会同慈善委员会构成了对慈善组织协同共治的立体化监管体系。

以慈善监督委员会为代表的慈善监管制度，为英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英国从福利型国家向以慈善金融为核心驱动的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型成为可能。

他山之石

另眼看世界

美印：共同愿景 不同路径

□普瑞姆·特里维迪 张 丽／译

近年来，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多方热议的话题。由于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趋同的战略愿景，两国都视对方为“天然盟友”。在过去的15年间，双边关系稳中有进。然而长期困扰美印深化合作的挑战依然存在：双方都希望取得满意的外交成果，但是在实现目标的途径上，无法达成一致。

为了充分挖掘战略伙伴关系潜力，美印两国都须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彼此格格不入的处事哲学，并在新的领域提高认同度，增强凝聚力。莫迪执政印度半年以来，释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信号，但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和印度哲学思维的差异不会在短期内消除。

从一万英尺的高空俯瞰，美印两国的首都是如此地相像。这种相似不是体现在景致上，而是渗透在观念中。第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都发自肺腑地热爱共和体制，并深信国家的繁荣依赖于对外开放和文化融合的政策。第二，美印两国都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希望看到这些极端组织在军事上被削弱，在意识形态上被击垮。第三，两国政府都很看重建立在开放市场和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第四，双方都主张通过多边外交途径解决全球问题。另外，美印都将对方视为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安全战略伙伴。

和多数国家一样，印度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国内各种传统哲学的汇集。国际关系学者康迪·巴吉派依将之划分为三大思想流派：尼赫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莫迪当选总理后，现实主义（强调硬实力）和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增长及相互依存）影响力在增强，相比而言，尼赫鲁主义在印度则显得有些衰落。

不同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BJP）一贯的姿态是，重视经济增长并推行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莫迪政府乐于看到印度军事力量的加强，包括在处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中。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并限制中国对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印度将与包括日本、尼泊尔、不丹和越南在内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莫迪的战略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印度意欲挑战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对此应该深感鼓舞。

然而，众所周知，新德里和华盛顿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印度长期以来秉持的三个外交原则使得美印关系趋于紧张。第一，印度是不折不扣的反干涉主义者（南亚次大陆除外）；第二，印度对多边体制不信任，视之为协调西方大国利益的工具；第三，印度一直非常警惕对任何国家形成战略依赖。这些“戒律”使得印度与美国在核心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读者可以通过以下外交事例的解读管中窥豹，见微知著。

中东合作的困难

美印处理外交事务的不同思路在中东地区显现无遗。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的进程明显加快，但印度从未亦步亦趋。因为在印度看来，只有征得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同意，才能实施干涉主义原则。现代印度继承了反帝反殖斗争时期的革命传统，对民主国家在自身疆域之外改变他国政治现实的做法不予认同。

尽管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印度仍在中东地区有较大的能源利益。对于美国公开宣称反对独裁统治、积极支持反恐行动，新德里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似乎已成为阿萨德独裁政权的支持者，叙利亚驻印度大使对此表示赞赏。

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印也未能建立紧密的联盟。印度担心伊斯兰国在南亚的渗透，一直宣称要进行反恐合作，但是并没有加入美国等六十多个国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新德里不愿意在中东显示军事力量，一是忌惮由此而引发恐怖分子报复的可能性，二是顾忌深度介入产生的不确定后果。

伊朗核问题给印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奥巴马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与德黑兰的谈判，期望通过逐步改善双边关系，使美国在伊核谈判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近年来，印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决中一直与美国保持同步。为确保国内石油进口，印度长期以来和伊朗保持了友好关系，因此，在是否加入西方国家制裁伊朗的问题上，印度的态度非常审慎。美国和伊朗在更广泛领域达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美国人的乐观情绪。印度可以抓住美伊利益联盟的契机大展身手，不要仅限于一个官方调停者的身份，而应积极召集三方进行深层对话。如果能掌握这个主动权，印度不仅能提升对美国和伊朗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展现其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独特的品牌形象。

全球经济与环境的挑战

就构建多边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性挑战而言，美国和印度往往会表现出短期优先考虑事物次序的不同和处事哲学的差异。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排斥多边方案，认为这是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机制。因此，印度和美国在世贸组织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生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印度似乎就是要故意妨碍议案的通过。奥巴马总统就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倡导各国积极应对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但是华盛顿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后，印度不愿意自己的工业化过程受到太多的约束。上个月印度政府对气候问题的熟视无睹更是让外界大跌眼镜，先是莫迪缺席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紧接着环境部长普拉卡什·加瓦丹卡竟洋洋得意地宣称印度的碳排放将会继续增加。

在气候问题上，印度强调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而且印度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而不是节能减排。通过采用一种不同的语调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姿态来应对，从表面看，印度并不会蒙受任何损失。然而，气候变化对南亚次大陆的影响极大，印度对该问题的蔑视似乎背离了其国家核心利益。

不对称的义务

美印之间在操作层面的分歧不断，加之印度对被纳入美国战略轨道一直心存芥蒂，使得美国有时会认为印度在双边关系上投入较少。这种不平衡感根源于结构性的现实。经历13年的反恐战争后，美国进入战略疲惫期，急于寻求战略伙伴共担全球安全与经济责任。印度则在与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在很多方面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上述国家都纷纷向莫迪政府伸出了经济合作的橄榄枝，因此，新德里对其不结盟外交政策自信满满，在目前的形势下，无需向任何国家进行外交倾斜。

印度无意于充当小伙伴的角色，美国对此表示赞赏。但是美国感觉挫败的是，印度也不愿加入地缘政治战略合作。美国对印度的许多核心关切鼎力支持，比如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印民用核协议等，但是美国感觉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对此印度已经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美国在没有落实所得权益承诺之前是不会承担全球责任的，而美国的观察家也发现印度并非不想成为全球领导者。印度或许会回应说，其消极行为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即便乔治·华盛顿本人也不会反对的。

因此，莫迪近期对美国的访问并非出于地缘政治关系的考虑，而是更倾向于建立经济纽带，实属意料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在新德里渐占上风，美印同盟仅限于适度扩大在安全合作和情报分享等非经济领域的合作范围。华盛顿似乎也在放缓美印同盟的战略构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欲速则不达。随着印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对多极国际格局的调整适应，美印之间聚合的区域会随之而增大。

目前，在伊朗核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印度面临提升美印伙伴关系的重大战略机遇：印度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重大的收益；印度还可以进一步证实美印伙伴关系有利于应对突发的全球挑战；阔步向前的莫迪政府或许能创造机会将美印宏大的共同价值观付诸相应的联合行动，我们将拭目以待。

（该文发表于2014年10月30日的《外交政策》杂志，作者普瑞姆·特里维迪目前担任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曾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赴印度访学）